

不斷自我革命 始終錨定國家發展總體目標

外國專家剖析中國治理模式優越性

中共二十屆五中全會昨日在北京開始舉行。針對中國治理能力與政策執行、長期戰略規劃以及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之間的關係等問題，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中國政府友誼獎獲得者丹尼斯·西蒙早前接受《大公報》專訪。他認為，回應上述問題需要以一種既認可中國共產黨制度優勢與發展成就，又能審慎評估中國治理模式所面臨挑戰的視角來審視。中國治理模式的核心優勢之一，是長期戰略與全國資源動員、政策執行能力的深度結合，基建、減貧等領域的成果已充分驗證其價值。

談及期待，他希望能從本次全會聽到四個信號：制度自我革新是長期執政能力的核心支撐，經濟發展必須始終與民生改善緊密聯結，中國將堅定不移持續推進改革開放，以及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必須配套更高效、更具回應性的治理體系。

大公報記者 朱燁北京報道



丹尼斯·西蒙希望能從五中全會聽到堅定不移持續推進改革開放的信號。圖為裝載着出口墨西哥的天然氣公交車的貨輪從山東煙台港起航。新華社



►西蒙指出，中國已進入了要求更高的經濟轉型階段。圖為機器人在山東青島的汽車廠進行焊接。新華社

簡介



丹尼斯·西蒙

- 丹尼斯·西蒙是華盛頓特區西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同時在北京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擔任講席教授，還出任全球人才組織聯盟主席。
- 他1981年首次到訪中國，曾先後三次長期在華居住。2015至2020年間，他在昆山杜克大學擔任執行副校長，此前還在美國多所頂尖大學擁有終身教職和高級行政職務。
- 2006年，他獲頒中國政府友誼獎，還曾獲授予大連市榮譽市民稱號。他擁有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文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以及紐約州立大學的學士學位。

三大核心因素 保持中共長期執政活力

制度優勢

中國共產黨為何能夠長期保持執政活力？這個問題在西蒙看來，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共產黨既擁有嚴密穩固的組織體系，又能根據中國不斷變化的經濟社會形勢持續調整執政優先級。

「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生命力，絕不能簡單用黨員規模或組織覆蓋範圍來解釋。如今超過1億的黨員規模確實帶來了極強的組織存在感，但體量本身並不能直接保證執政效能。真正關鍵的是這個組織如何運行，以及它能否持續為民眾創造發展成果。」他認為，有三個相互關聯的核心因素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統籌和執行能力 賦予制度優勢

西蒙具體指出，首先，中國共產黨



▲10月20日，浙江嘉興的工作人員在政務服務中心為群眾提供服務。新華社

形成了獨特的長期戰略思維能力。它始終錨定超越短期經濟或政治考量的國家發展目標，在重大國家優先級上保持戰略延續性，同時根據形勢變化調整執行路徑，這是一項重要的制度優勢。其次，中國共產黨展現出了極強的適應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結構、社會構成、科技實力和國際地位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中國共產黨也隨之不斷調整執政方式，適應這些全新的變化。從以農業為主的經濟體轉型為世界級的工業和科技強國，這一過程不僅需要經濟領域的改革，也要求治理體系、行政管理和決策機制做出重大調整。第三，中國共產黨始終高度重視組織紀律、幹部隊伍建設，以及把中央政策決策轉化為全國各級實際行動的能力。這種統籌協調和落地執行的能力，是其制度優勢的重要來源。

西蒙強調，檢驗一個執政黨生命力的最終標準，是它能否始終保持自我審視的能力，及時發現問題、糾正偏差，回應不斷變化的公眾期待，維繫民眾的信任。「中國共產黨的長期活力，不僅取決於組織紀律和政治延續性，更取決於它能否持續推進制度創新，鼓勵建設性的批評建議，提升治理透明度，切實回應普通民眾的現實關切。」他說。

自我革新不能停留在紀律層面

第一，制度自我革新是長期執政能力的核心支撐。西蒙提到，中國共產黨反覆強調嚴明紀律、反腐敗鬥爭和深化黨的建設的重要性，在當前中國面對更複雜的經濟、科技和國際挑戰的階段，這一點尤為關鍵。但制度自我革新不能僅停留在紀律約束層面，更要延伸到提升治理質量、強化行政問責、鼓勵創新創造，確保各級官員既具備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也擁有主動作為的正向激勵。「一個高效的執政黨，必須能在制度缺陷演變為阻礙發展的嚴重障礙之前，主動完成自我更新。」西蒙說。

第二，經濟發展必須始終與民生改善緊密聯結。中國已經進入了要求更高的經濟轉型階段，當前的核心優先級包括提振國內消費、創造更優質的就業機會、優化收入分

配、應對人口結構挑戰、擴大優質公共服務的覆蓋範圍。「我期待這次全會能再次強化一個共識：經濟增長的最終目標，是服務於提升全體民眾生活質量這一更宏大的發展方向。」西蒙說。

第三，中國將堅定不移持續推進改革開放。即便在地緣政治摩擦加劇、外部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堅持與國際經濟深度聯動，依然能為中國帶來巨大收益。「我期待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體再次釋放明確信號：中國將持續優化營商環境，鼓勵創新與創業，吸引國際投資，拓展互利共贏的國際合作。」西蒙說，「這對於維繫國際企業、投資者、科研和教育機構對中國的信心至關重要。」

確保技術進步廣泛惠及全社會

最後西蒙表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必須配套更高效、更具回應性的治理體系。他指出，人工智能、生物技術、先進製造等領域的技術進步，正在重塑經濟與社會形態，這些變化在創造新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全新的治理挑戰。中國需要建立起能預判人工智能等技術發展趨勢、管控新興風險、維護公共利益、確保技術進步廣泛惠及全社會的治理體系。

展望未來，西蒙認為，二十屆五中全會可能會帶來三方面的重要

影響：首先，它將進一步強化中國共產黨的制度能力，鞏固政治紀律和組織問責的重要性。其次，它將為「十五五」規劃各項優先級的落地實施，筑牢更堅實的制度基礎。第三，它將向國際社會傳遞重要信號，清晰展現中國在治理、經濟發展以及應對充滿不確定性的全球環境時的立場與路徑。

「我期待能從這次全會看到：中國下一階段的現代化建設，不僅需要強有力的政治領導和長期戰略規劃，更需要持續的制度改革、更強的政策回應性，以及改善民生的堅定承諾。」西蒙說，「希望本次全會能清晰展現中國共產黨將如何把自身的執政理念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發展成果。」

西蒙指出，當下許多國家的政府都面臨一個共同挑戰：難以保持政策的連續性。中國探索出了一套重視長期規劃、政策協同，並且能始終錨定國家發展總體目標的制度路徑。「『五年規劃』就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他說，它能幫助政府明確發展優先級，統籌協調國家與地方的發展策略，調動公私領域的各類資源，同時還能根據實際形勢變化靈活調整政策。中國取得的成果，已經充分印證了這一治理模式的潛在價值。

中國高效能治理經驗 值得發展中國家借鑒

中國模式

談及中國治理模式給發展中國家政黨帶來的參考意義，西蒙認為，第一，要高度重視長期戰略規劃。各國政府需要跳出眼前的政治和經濟壓力，制定出連貫清晰的國家發展願景。第二，要不斷強化國家治理能力。僅有好的政策遠遠不夠，政府必須擁有完善的行政體系、專業的人才隊伍、充足的財政資源和強大的組織能力，才能把政策目標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發展成果。「中國的實踐證明，把中央的戰略方向與省、市、基層的落地執行緊密銜接至關重要。」

「關鍵在於及時修正錯誤的意願」

此外，要圍繞國家核心優先級統籌調動資源。「發展中國家往往面臨資源有限的困境，中國的經驗表明，政府可以通過協調公共投資、引導私營部門參與、聯動金融機構和地方發展舉措，共同推動重大國家發展目標落地。」西蒙說。

西蒙續指，還需始終堅持務實精



▲中國模式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參考。圖為埃塞俄比亞工人在當地的中國品牌手機生產線上工作。新華社

神，鼓勵政策試點探索，並且在推進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維護社會穩定。

「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一個極具特色的做法，就是先在地方開展政策試驗，評估實際成效後再把成功經驗向全國推廣，經濟特區的設立就是典型案例。」他說，「這說明高效的治理不需要政策從一開始就完美無缺，關鍵在於建立制度性的學習機制，擁有及時修正錯誤的意願。」

他同時強調，中國的治理模式絕不是可以被其他國家簡單照搬的通用

模板。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政治制度、歷史背景、社會結構和發展挑戰。西方民主體系也能提供諸多值得借鑒的經驗，尤其是在政治問責、獨立機構建設、公共監督和個人權利保障等方面，這些特質與高效的發展治理並不必然矛盾。因此，富有建設性的國際討論，不應糾結於相互競爭的政治標籤，而應聚焦於探索能提升政府效能、強化問責機制、優化公共服務供給、創造經濟發展機遇的務實路徑。

以人民為中心 托舉更高質量經濟增長

核心價值

西蒙認為，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思路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它最核心的價值是把國家發展目標和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需求緊密聯結在了一起。

「中國改革開放發展歷程中最具標誌性的成就之一，就是極大改善了數億民眾的生活水平。」他舉例稱，比如脫貧攻堅，中國讓數億人擺脫了極端貧困，這一成就在人類歷史上都具有重大意義。

西蒙還提醒，以人民為中心理念的價值，不能僅用脫貧成果來衡量。比如，中國在擴大教育機會、改善農村基礎設施、提升醫療保障覆蓋率、建設社會保障體系等方面都取得了長足進步，這些成果為社會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經濟增長和民生改善不是相互獨立的兩個目標，而是相輔相成的。」西蒙說，經濟發展能為公共服務升級提供必要的資源，而更優質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和就業機會，又能提升人力資本水平，反過來支撐更高質量的經濟增

長。

下階段應邁向更平衡增長模式

如今，隨着中國進入截然不同的發展階段，西蒙認為，「當下的挑戰不再是簡單地讓民眾擺脫貧困或是擴建基礎設施，更多轉向了提升發展質量、讓發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體民眾。」

具體而言，他認為應關注以下問題：比如青年群體的就業與發展機會、收入分配優化與不平等等問題的緩解、醫療與養老保障體系的完善、面向全民的公平優質教育，以及持續維繫全社會的公共信任等。

「理念層面和切實回應民眾需求二者之間，並不能畫等號。」西蒙提到，後者還需要暢通的民眾訴求表達渠道、有實際意義的政策反饋機制、制度化的問責體系，以及政府部門主動調整無效政策的意願。他認為，下一階段的發展，需要在脫貧攻堅和基礎建設的既有成就之上，進一步邁向更公平的機遇均等、更高質量的公共服務，以及更平衡、更可持續的增長模式。